

文集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

第五卷

徐中玉 著
王嘉军 编

文集



徐中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中玉文集

第五卷 目 录

文艺理论研究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

文章 1345

- 我怎么会搞起文艺理论研究来的 1347
- 试论当前文论中七个问题 1351
- 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369
- 文艺理论的学习与创新 1386
- 对高校文艺理论教材改革的建议 1392
- 学习文艺理论研究的一点体会 1395
- 文艺理论研究必须促进创作繁荣 1400
- 论文艺的歌颂、暴露与讽刺 1409
- 使命、责任、价值 1419
- 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 1425
- 关于“当代意识”的思考 1431
- 略说“灵感” 1437

- 批评的伦理 1440
- 评朱自清著《标准与尺度》 1455
- 评李广田的《文学枝叶》 1462
- 评巴金的《家》《春》《秋》 1470
- 对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些感想 1484
- 文学的形象性 1490
- 文学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 1506
- 我们这里不应有“开端便是顶点”的作家 1516
- 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1527
- 探讨新方法,改革旧观念 1536
- 勇当改革闯将,争攀文艺高峰
- 首届“上海文学作品奖”的总结发言 1545
- 关于“寻根”的断想 1551
-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途径无限广阔 1554
- 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
- 读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 1561
- 《讲话》的根本精神 1573
- 总目标、大道理及其他
- 读《邓小平论文艺》 1580
- 谈文艺的群众化 1586
- “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1589
- 真正贯彻“百家争鸣”,才能实现“百花齐放” 1598
- 迟到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1603
- “否定”不等于要“砸烂” 1607
- 真实的才得永恒 1610



文艺理论与现当代文学 批评的文章

我怎么会搞起文艺 理论研究来的

我爱好研究文艺理论，特别是我国历代的文艺理论。究竟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的，最早也许还得从读初中时候对国文课感想说起。

初中三年我全读的古文。学校是在清代梁丰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文教师开头是一位很喜欢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两年之中，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姚鼐、梅曾亮等的作品，当然，唐宋八大家的他也讲。今天记得还很清楚的，是他好像特别愿讲充满感情的祭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和袁枚的《祭妹文》至今印象犹深。他总是要求学生把讲过的文章背出来，平时叮嘱用笔默写，考试时就一定要把学生叫到他桌旁站着，当面背出他随口指定的某一篇或某些段落，再加几首唐诗。对所讲的文章，他总竭力称赞，一面称赞一面就在课堂里朗读起来，读得抑扬顿挫，兴致非凡。他要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朗读，说朗读可以读出意味来，别人也可以从你的朗读里知道你领会的程度。这道理我们当时都不懂，只因为规定要背诵，不能不在每晚自修时间琅琅读起来。我是寄宿生，每晚都要在教室里自修两小时，实际是上两节自修课。第一节只许大家看书，做数学题，不能出声，以免互相干扰。第二节就可出声了，国文也好，英文也好，都可以各自大声读出来。本来第二节时不免都有点睡意，经互相这样放声一读，就把睡意全赶跑了。因为每晚都有时间把前面讲过的复背几遍，刚讲过的读它十遍八遍，所以考试时要我们去当面抽背全学期讲过的诗文，便并不怎样担心、惊慌。这位老先生对旧学无疑有根底，可在教法上，他主要就只着重了让我们朗读和背诵。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生活经验极少，老先生虽然竭力称赞所讲的文章，但具体指点不多，要我们自己单从朗读和背诵中真正领会出文章的好处，是困难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个疑问：这些文章究竟好在哪里？如果真是好

文章,那些名家是怎样才写得出来的?我自然没有敢提问,后来即使敢问也已来不及,因为教过两年,这位老先生就因病回家去了。初中最后一年的国文教师仍是老先生,也仍教我们文言文,口才不如原来那位,对我们的要求也松得多,我们逐渐不那样认真朗读了。现在回想起来,倒还是原来那位对我们帮助大,虽然他并没有更多地培养我们识别作品好坏高下的能力。

高中三年,我因家庭经济困难进了免费还有饭吃的师范科。这次因为国文教师是位用白话写小说并已出版过两个集子的作家,所以一下子进入了个鼓励我们多读白话小说的新环境。三年中国文课换了三位教师,先新后旧,最后又来了个亦新亦旧的。课外杂乱地读了不少白话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可从没有接触过文艺理论书。看小说主要为故事情节所吸引,仍没有什么辨别力。当时倒是订阅了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觉得他写的“小言论”真好,但它是政论文,并非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也读到一些,有些看不大懂,当然不能知其伟大。初中时代心里存在过的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较明白的解答,不过多读了些新作品,眼界开阔了一些而已。

1934年,我在当完两年小学教师之后(算是服务期满)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因为是专读中文,课程又开得不少,才知道还有“文艺理论”这门学问,正好可以解答我向来的疑问。老舍先生教我们“小说作法”,洪深先生要我做他排演《寄生草》的助手,谈话中常说到可以读些这方面的书。可是当时并无“文学概论”这门课。直到三年级,才听到叶麀(石荪)先生开的“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由于这两门课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加上叶先生的亲切指导帮助,我就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了。

叶先生是留法留美学心理学的,原在清华执教。自己极爱文学,能填词,读过很多古代论文谈艺之书。给我们讲课时,往往结合他自己创作和阅读的经验,从具体作品出发,来谈批评鉴赏的原理。如上所说,这正是我在初中时代就开始想知道一点的知识。他能够随手拈来,把欧阳修、苏轼、严羽、叶燮、王国维等评论诗文的观点介绍给我们,说不必迷信外国,我们自己历代有极多这方面的宝贵材料值得阅读,中文系学生还应负起搜集、整理、加以深入研究的责任。他在课外有时参加我们的文学集会,有时同我们一道到郊外去爬山,常常邀我们到他家谈天。他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他的议论、风度、热情、工作方法都给我深刻的印象。我告诉他很愿研究文艺理论,但三年读师范、两年当小学教师时把英文几

乎丢光了，现在赶不上，怕不行。他说：那就集中精力研究本国的材料罢，这也尽够你钻研的了。在他的指引下，于是我也摸索着用卡片积累起研究材料来。正在积极动手，七七事变发生，叶先生回川大任教去了，我也辗转迁徙，又无书籍，仅仅开了一个头的研究，只得停顿下来。

1939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毕业之后，正是因为想再搞停顿下来的研究，宁愿放弃已经到职的不坏的位置，又考进了当时迁在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两年时间内专门读了宋代的大量诗歌理论著作。李笠（雁晴）、冯沅君、陆侃如、穆木天等先生都担任我的指导教师。当时听说郭绍虞先生有《宋诗话辑佚》出版，特去信北平求教，意外地很快就得到他来自远方的复信，并还寄赠了当时极为难得的这两大册著作。第一年在澄江城外荒山上斗母阁的油灯下，第二年学校迁回粤北在坪石祠堂式院舍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我孜孜兀兀，心想手抄，积下了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一篇论文。这些卡片现在看来有些无甚作用，论文也多疏漏，但到底锻炼出了一种较能刻苦的习惯，可以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干下去，进行不倦的探索。这以后，我留在中山大学教了五年书，胜利后从广州北返，解放前后一直在上海各大学工作。直到今天，教的课，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无论在“反右”扩大化的挫折后，还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的牛棚生活之余，我都坚持读书、积累、见缝插针，尽量不让光阴浪掷。我深信这门学问总是有用的，即使自己只能作出极其微小的贡献，也是有益的。

我是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材料非常多，而且很分散，怎么办？只有一点点地披沙拣金，积少成多地干起来，持之以恒地干下去。古代文论有专著，更多的是在作家全集中的散篇碎著，还有随笔、杂记、小说、戏剧等书中的零星记录、序跋甚至对话。只要脑筋里随时装着许多问题，处处都能遇到有用的材料。例如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如不结合他的《沧浪吟卷》来研究，往往就误解了他的主张。研究其人的议论，又不能不知其人，知其世，知其针对着什么而言，等等。治学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握的实际愈完全，基础就愈牢固，研究也愈可能深入。四十多年来，断断续续我手抄笔写的材料总有两三千万字，若无运动干扰，当还可以加倍罢。尽管也抄了不少无甚用处的东西，而且现在也决不能即以抄下的东西作很可靠根据，费去了这多时力我是不悔的。我走过弯路，曾想从先秦古籍一路读下来，这样来写一部文论发展史。

费了很多精力,后来感觉这样走不通,至少我自己并无如此大的才力。战线拉得太长,社会到处是漏洞,反不如选定一些侧面,某个时代、流派,甚至一家一书进行研究,比较可以周密、深入一些,或能有点贡献。通史、总论一类大书,只有在大量专题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利用集体创造的丰硕成果,才写得好。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情,为未来的高楼大厦准备一砖一瓦。所以我就把研究目标逐渐缩小,直到现在的定为古代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目标明确,且或力所能及,时间精力可能集中使用在焦点上,较易突破旧观。

有了材料,要做出学问,还要“求”。辨别、比较、分析、综合,都是“求”。当然还有个指导思想的大问题。古人也有他们的“求”法,有些“求”法也不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能帮我们大忙。这是指已经有了“实事”的“求”,高一层的工作了。“求”的是“是”,非指初期的主要目的在“求”尽可能丰富翔实材料——“实事”了。积极、勤奋、甚至拼命一般的“求”的精神,将能保证一个学者长期工作之后总会作出一定的成绩。

什么是“是”呢?我以为就是符合客观实际、规律性、真理性的知识。最好的文章,便是真善美三者兼备的文章。艺术地抒写出了人们真实健康的思想感情,能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丰富美化人的生活。名家为什么能写出好文章来呢?如果他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缺乏进步的思想,不懂得如何艺术地描写事物,当然不行。初中读书时代心里存在的疑问,老来想想,大概可以这样回答。“是”的知识一旦被大家共同“求”了出来,普及开去,对每一民族,全人类的进步发展,都有极大意义。常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以为主要就是从古和洋的文化遗产中,找出一切“是”的东西,来为今天的建设服务。

我已六十八岁了,学业无成,精力却已日衰。但在专业研究的道路上,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求是”下去。生命的意义,不正是可以不断地为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而追求么?

(原载《书林》1982年第3期)

试论当前文论中 七个问题

一、对历史负责

我很赞赏也很关心文学研究界近来出现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的举动。其实,文学史从来都是在不断地被重写的,时代在前进,社会生活在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包括文学史观也必须要发生变化,因此,文学史不断被人们重写本身就是十分正常和自然的了。

说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封闭状态,特别是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们越来越远离了民主与科学的“五四”传统,只是单一地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现象,这就使得我们对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显得很狭窄,而且,虚假的、不符合生活和历史实际的东西很多。因此,对这一段文学史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就尤为必要。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是为了对历史负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造成以往文学史研究中失误的原因很多,因此,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段历史时,尤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掌握分寸感。在这里,我觉得有两点是应该分开的:

首先,应该将作品与作家区分开来,不要简单地把作家的个人品格和作品联系起来。在今天看来,现当代文学中有许多作品中虚假的成分很多,但这和当时的理论倡导极有关系,如“革命文学”、“党性原则”等。有人说,许多作家在

解放后是“思想进步,艺术退步”,其实,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情况如何。因此我认为,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时,对作品的评判应严格,对作家则应该宽容而不是苛求。

其次,应该将不同的作家区别开来。应该承认:在作家队伍中,确有一部分趋炎附势、赶风向、逐浪头的人,但更多的作家则是真诚的,他们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讴歌新社会,如果说柳青的创作是一种悲剧,那也是诚心诚意的悲剧,尽管他的创作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柳青本人的真诚还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不应将所有的作家一概而论。

总之,反思历史是为了今天文学的发展,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反思的时候,也不要离开当前广大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研究时所应具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原载《文艺报》1989年5月27日)

二、“历史”应该重写

“历史”是否应该重写?似乎早该不成为问题了。但当真有人要重写时,惴惴然,愤愤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者依然不少,其实大可不必。

真实的历史无法重新编造,纸上的“历史”一直在重写。正史、野史从来就不少。都可以翻翻,完全相信它们所说都会受骗上当。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做重写的工作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经验之谈,不是毫无道理。觉得材料多些了,真实性提高些了,实践中获得了更有力的证明,而旧说一甚至是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之说实在太足以贻害后人,误尽苍生,自然就有些刚烈之士毅然提起了他的直笔。以为重写出来的一定很完美无缺,也难。人孰无过,谁少局限?总不能因此就抹煞重写的作用和价值。事实上人们也不会就被唬住的。千百年前的帝王将相且不说,只要民主自由稍为露出了一点缝隙,即使十年前的风云人物不是也多已逐渐在显示其绝非什么“天纵之圣”、“特殊材料”一类的真容吗?而在当时的一大堆“正史”中,他们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哩。不让假象继续欺骗、愚弄人民,对我们的彻底改革只有好处。因为碍脚石可少些了。看来,改革的彻底程度,顺利程度,正是与重写历史与重创历史者的胆识、智慧、理论勇气、一往无前的真正历史观,成正比例的。

上面是就纸上的历史而言。因为它们总被感到存在着越来越多不可靠、不真实、信口雌黄,甚至为了圈子利益而胡说八道的东西,所以必须重写。必须重写的理由很多,认为无需重写当然也会有其种种说法,可惜腹诽者多,摆事实讲道理的少。归根到底,恐怕总觉这样一来自于本圈子多所未便罢。不同的是重写者们恰恰并不顾虑到这一点,此即其所以为高处。腹诽者们中有的当初也曾重写过或主张重写过历史,只因现在地位不同了,既得利益也沾到了些边,主张态度才变了。变得只好躺着、直不起来了。

至于生活中的汹涌澎湃的历史,那就更应创新,谁也阻挡不住,螳臂不缩回去就得折断。这新的历史也有重写的任务,即它是怎样形成,冲决而来的。未必已经对此有了完整、深入、真有说服力的理论。今天的历史将向何处去?究竟哪些真还有无穷的生命力,哪些真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结合当代科学的发展,人类未知的领域简直难以想象仍有多大。我们的可怜之处正在过去非常容易就轻信了某种似乎已经到达顶峰的结论,接着就给按倒膜拜在地。我们自己的地位、骨头在哪里?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自己究竟起了和该起什么作用?难道我们只能或甘心情愿当应声虫、叩头虫的角色?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曾大声喊出他一度“宗经”、“征圣”后的心音:

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重写历史(包括重写文学史)的同志们,非常需要重视刘勰这种“不屑古今”的独立思考精神。认真切实掌握到了时代的“势”与“理”,对人对事的分与寸,侃侃而谈,真金不怕火炼,论事不必全要诛心,各人都可以说各人的老实话嘛。无所顾虑的,新的道路就将从你们的脚下展去远方!

1988年12月9日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

三、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目前正在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

值得受到重视,应该拨乱反正的大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不妨从哲学、逻辑学、美学等理论高度来进行讨论、争辩,反正各种理论著作甚至“经典”著作中有的是各种字句,可以引来咬嚼很长的时间,这也并不是毫无意义。但人们恐怕更多地盼望从生活实际和创作实际中来明白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许多文艺评论研究文章似乎总爱谈得很抽象、玄虚,或者认为只有这样谈法才显示得出高深的理论思辨力量,结果是这类文章的影响总难越出自己一部分同行的极小圈子去,连从事创作的同志都很少愿意来读这些文章,实在可惜。理论不是应该尽量交给广大的群众吗?

我所以深感提出这一问题的重要,很简单,就因我们现在要实现改革的大业,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更重要。但即便是认识世界,也需要依靠人的创造性实践,勇于积极探索的主动努力。我们被“驯服工具论”薰陶得太久了,似乎绝大多数人应该不必动脑筋、想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听从随便什么号令,紧跟着走,自然就能达到幸福的彼岸,一切大吉。许多人因此安于做“物”的随从,心安理得地变成了制造封建法西斯专制的、愚昧落后的工具,失掉了“万物之灵”这句古话也体现出来了的人的本质含义。谁要强调一下人的意志、尊严、权利、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容易就会触犯禁区,苦头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实际上的一潭死水、万马齐喑,往往被称作上下一心,完全一致的好事情。活泼泼的主体都消失了,生命力旺盛的群体何尝真正形成?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和文学评论上,便造成了假、大、空,公式化和概念化,机械式的千篇一律,说不服人也极少有人要看的的一个调子。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文艺界需要大力改革、突破、医治的老框框、痼疾吗?在不可逆转的改革洪流中,我们应该欢迎一切立足于振兴中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胆探索。首先认清并肯定这样的探索对我们的事业是如何必要,而不应脱离了实践和改革的效益,还是专门从过去的一些字句中去作烦琐的较论,好像一切过去的议论已早完美无缺,任何新的探索都是不必要的,甚至都是离经叛道的了。这岂不还是在“唯书”,而缺乏了最重要的“唯实”精神!如果要谈方法,我认为不在这一前提上先加以端正,恐怕很难有什么好作用。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任何烦琐的议论和迹近吹毛求疵的批评都不可能获得大多数读者的同情。

摆脱传统理论研究的思维定势,充满着创造活力的探索并不一定都那样严密,那样无瑕可指,这是很自然的。主体性不可能不受客观世界的制约,这没有疑义。问题在我们今天必须承认并发挥主体的积极能动作用。人在这种情况

下如何发挥这种作用,承认它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超过了什么限度便会走上唯心主义或非理性的歧途,这是应该讨论,力求搞清楚的。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能够通过平等的争鸣帮助解决这些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完全不必忧虑,可虑的倒在执滞在它的一些字句上而忘掉了实际情况的变化;不能在新事物、新情况面前显示出它应有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载《批评家》文中的一节,1986年第11期)

四、现在能不能再有轰动效应?

十年来文艺界出了不少作品,崛起了不少新作家,外国几十年来的各种学说、观念、方法、主义,也都被争先恐后、由表及里地大致介绍过来了,这是自由、民主由缝及窗逐渐掀开后取得的结果。十年前谁能想象很快就到达这样的一天?确是个得来不易的局面,值得大书的贡献。但若论起十年来已产生了如何如何“光辉”,堪称“转折点”、“里程碑”、“史诗”式的巨著,则除在某些“拉拉队”式的文章中确曾提到一大堆之外,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实在非常之稀少。有的能领风骚几十天,热闹一两年的就算不错,再上去便是凤毛麟角了。

这情况奇怪?可悲?我看并不。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短的一瞬,全世界几千年来才产生了多少部公认的巨著!何况巨著的产生原需要多少复杂条件的配合,谁都知道这极不容易,不能靠碰运气去捡来。

然而总也应该有个可以盼望的苗头,为产生巨著认真打下点牢固的基础,条件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巨著,全人类都需要这种共同的财富。如果自然科学方面已经成果累累,而且出现巨大成果的来势很猛,为什么人文科学方面就非落后一大截呢?

巨著自然有“轰动效应”,否则就称不上是巨著了。但却不能笼统反过来说,凡有过某种“轰动效应”的便是巨著。同样是轰动,范围有大小,时间有长短,内容有深浅,性质不同,价值迥异。街头巷尾泼皮淋漓尽致地互相骂架,大庭广众中装疯卖傻,发点奇谈怪论,或者幸灾乐祸地揭些别人的隐私,还有那种挑逗卖弄性的动作,都可能引起一大圈人的围观或拍手跳脚地叫喊。未必不可说他们这种表演也有某种“轰动效应”,哗众原就可能取宠一时嘛。这种“轰动效应”过去有,现在仍常可遇到。不足谈的姑不谈,那些唾沫四溅,洋洋洒洒,古

今中外，上下数千年，纵横十万里，似乎什么科学都懂，什么知识全备的高谈阔论与夫巨制鸿文，不是颇易听到见到吗？这些东西其实并无那么大的力量会亡国灭种，可离人们急需的巨著却是极远极远的。金代学者周昂有这几句名言：“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惊四筵与适独坐，取口称与得首肯，不一定总矛盾，但这几句话自有其卓见在。即有“轰动效应”的不必便是好货色。独坐时可以好好想一想，比一比，用不着虚应故事去附和几句、拍几下掌、点一下头了。在比较自由，和明显感觉自我之存在的时候，价值标准就会高起来。

虽然如此，“轰动效应”我看还是值得重视。否则，就不必讲究社会效益了。但既要讲社会效益，就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两种效益同样能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会有的，虽未必多。现在各种“古本”、“真本”、“全本”的《金瓶梅》正明明或半明半暗在纷纷出笼，据说这部书中确有“黄金屋”“颜如玉”可挖，是个不尽的富矿。我从未主张禁止这部书，但对老是紧盯着其中曾被删除的东西视为全书宝藏所在这种鉴赏心态，竟连国家出版社也看得眼红起来，还定出了什么凭级别才售与的种种怪诞办法，实在感到可悲得很。这真是在考虑提高全民族已经不能低得再低的文化素质之良法吗？可以盼望出现真正巨著的苗头就在这里？为产生巨著认真打下点牢固的基础就在这里？条件可从这些地方创造起来吗？

也还有些难于苟同的议论，如说现在既已多元化多样化了，各人趣味、爱好不同，要求轰动众人的效应就不可能有。如过去那种千篇一律、人工制出的“轰动效应”既已不值一谈，今后便当安于逸豫，各人想说什么就说到，想怎么玩就玩去，“我”就是一切，何必还要去追求什么“轰动效应”。真是这样吗？我们已没有或无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我们已只消满足主体的无论什么欲望和要求？我们能凭这种想法和行动来证明主体的价值吗？

我不认为这样是对头的。这样想这样做的作者不可能写出人类需要的真正文学巨著来。他们是在人类“大我”的艰难环境里只想先实现他“小我”的愉快。没有群体目标的人也实现不了他个体的目标。真正的“轰动效应”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鼓励与赞赏。范仲淹《岳阳楼记》里如果缺少了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群体目标，能设想成为千古传颂的名文？而他这一思想早在孟子的文章里已有所表现了。未必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方会有这种思想，有这种思想的往往并不信奉儒家学说。这是一个有高尚品格、远大理想的

大写的“人”都应有、都会有的想法和做法。居安尚须思危，居危而尚不知思危并苦心焦虑如何解危的人肯定写不出真正的文学巨著来。不要说这又是什么“题材决定论”，“从属于政治论”。一个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什么题材中，无论在如何写法中，都能显示出他的伟大。离开了或远离了广大人民的哀乐，就只能渺小、沉落。

多点理想，多点激情，多点毅力，多点苦功；少点蝇头实惠想法，少点玩世不恭，少点轻飘浮躁，少点急于求成总想一鸣惊人罢。青春应似火，老年当更成。现在仍能有仍应有真正的“轰动效应”，关键既在争取我们应有更加自由、民主的时代、环境，同时也不能忘掉或忽视了我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试去任何一个街头巷尾，任何一个客店车厢，人民有那么多辛酸、焦灼、苦情与热望，面对这么丰富的矿藏，而却仅以得领几天风骚便沾沾自喜，甚至还要四处托人去硬把自己捧成什么精英，有空独坐想想，或者也会不自首肯，那就真的是“好得很”而非“糟得很”了。

1988年12月9日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

五、两个“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里本已讲得很清楚，也不知已被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者”和“最最革命”者重复过多少遍了，但事实证明这些人并未了解，实行的更少。“四人帮”逞凶时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可对马克思革命遗教的破坏和违反，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中间亦包括这两个“最彻底的决裂”。

记忆犹新，那时候所谓“最彻底的决裂”，就是“打砸抢”，就是破坏、烧毁，就是以广大革命同志为专政对象，就是把中外文化遗产“彻底扫荡”。真要这样乱下去的话，显然已不是什么“决裂”的问题，而是要亡国亡党的问题了。

第一个“最彻底的决裂”，非常清楚，原是针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包括奴隶主阶级所有、封建主义所有、资本主义所有在内的私有制关系的，是要同这种私有制关系彻底决裂。决裂了，如还不够彻底，就该进一步，做到“最彻底”。